

正德官窯青花阿拉伯文

翁宇雯

七孔球形器用途考

本院藏有一件青花作品，器身穿孔整體呈球狀，底下又連著一個座台，乍看就像一顆球架上的保齡球，器表還寫了充滿異國情調的阿拉伯文字。它，不是舶來品，是明代中葉的官窯精品。此器是帽架？筆插？香爐？花插？本文試探究竟。

這件作品（圖一）高一九．六公分，球徑一六．八公分，足徑一二．一公分，尺寸不大；器身以略顯扁圓的球形與空心底座兩部分結合而成，中以短直頸相連但彼此並不相通。全器除底座著地處外均施滿釉，釉色略泛灰黃，並以青花鈎料繪製紋飾。覆蓋於器頂的是比例對稱之複線六瓣花型開光，每一花瓣恰對應一指頭大小的圓孔，六孔中又置一尺寸稍大的圓孔，佈局成「七曜形」，且每孔都以青花雙弦紋圈起為飾，其餘以

雙鉤填彩筆法描繪密佈的捲草紋。在器頂花形開光的兩端，又各連接一錨狀與圓點紋飾，巧妙地將視點從器頂移往器身，並指向了球體前後的兩面開光；該開光為圓形內接複線菱形方框，四角間飾兩頭飄帶雲紋，內書帶標音符號的阿拉伯文詞句，分別為：「الله أكبر」與「لا اله الا الله」，漢譯為：「阿拉會保佑他的國土，也會保佑他的子孫。」器身其餘部分則繪有較花形開光內略大而佈局疏朗的捲草紋；器座與底連接處飾四處等距

波浪鏤空，座頂與底間各帶雙弦紋，間飾雲頭紋；底有「大明正德年製」六字雙行直書楷款。

正德官窯瓷器以大量出現的回文裝飾與新穎器型，在明代官窯瓷器中獨樹一格。而這件作品不只器表飾有阿拉伯文，球形器身以及頂上鑿有七孔之特色更是於歷來所未見。然而，這件作品在正德朝並非孤例，在大英博物館亦典藏有兩件相同樣式的七孔球形器。（圖二）仔細觀察，此器的七孔內均帶釉，況且全器一體成



圖一 明正德 青花阿拉伯文七孔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唐 越窯青瓷球形盒 安徽省六安縣椿樹鄉唐乾符三年盧公夫人墓出土 引自張柏，《中國出土瓷器全集·8·安徽》



圖四 元 青花花卉紋球形器 伊朗國家博物館藏
引自http://big5.china.cn/gate/big5/wenhuaui.china.com.cn/zxzt_article.php?id=33172

的製作脈絡思考，希冀能為這件球形七孔器之用途理出一條思路，以彌補研究史之缺憾。

球形器二三事

轆轤的發明是陶瓷工藝技術史上的重要里程碑，這使得陶瓷工匠於製作圓形器時遠比方形器或不規則器簡易，因此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器皿中，圓狀之盤、碗等遂俯拾皆是。然而，作品呈現球狀立體造型者卻如鳳毛麟角。一九八四年安徽省唐乾符三年（八七六）盧公夫人墓曾出土一件（越窯青瓷球形盒）（圖三），雖然呈現球體狀，但乃是以帶圈足的器身與盒蓋組成。而宋代時球體鏤空的帶座香爐造型蔚為風行，尤以景德鎮青白瓷作品為多，雖然這種球形器身帶座，與正德七孔球形器相仿，但和前述越窯作品同樣以盒身兩部分構成，況且器身飾滿不容一指通過的小鏤孔，雖構成其「香爐」揮發散熱的用途，但與正德七孔球形器的結構相異甚遠。

如果要尋找器身呈球形，而頂蓋亦鑿有圓孔的作品，則可見於幾百年前曾為薩非王朝（一五〇一—一七三六）國王阿巴斯二世（Shah Abbas）貢獻給阿德比爾神廟、而今藏於伊朗國家博物館的〈元青花花卉紋球形器〉（圖四）；這件作品雖不帶器台，但呈現球狀，且器身帶有一徑四·三公分的圓孔，唯整體尺寸與正德器相比略小（腹徑一二·五公分）。李仲謀先生依據其器身後刻波斯文標記文字的方向看來，鑿孔處在頂端，但鑿孔處的紋飾殘缺不全，且釉面有磨去痕跡，因此這件作品可能並非原製作時面貌，原孔或許較小，據比較後推

日之際，對於七孔球形器卻始終摸不著頭緒，令人想要一探究竟。

在解決陶瓷史中器形用途與功能問題時，常仰賴繪畫中所見器式作為重要參考資料，但限於目前所見，這件作品同樣無法在古代繪畫、壁畫，甚至版畫當中覓得蹤跡。因此，筆者欲從該作品器形本身著手，觀察尋找歷代中相似樣式的工藝美術品，同時針對前輩研究者對於此作品的功能判定一一檢視，尋索最接近事實者。此外，當然也不能忽略從整體正德官窯

型，可見並非後鑿或經過改裝拼接，不過實際用途不明。而從本院的著錄典藏編號「呂-617-78」，也可推知典藏七孔球形器原屬清宮舊藏，且放置於紫禁城的重華宮、養心殿、華滋堂、燕喜堂或體順堂等區域。這件七孔球形器雖然充滿問號，但關於其用途與功能，目前尚無專文探討；不過見諸於圖錄刊載的作品說明或者針對該展品的「定名」，也可探知作者或策展人之心中心意向，得出有「帽架」、「花插」、「筆插」、「香爐」等臆測。（註一）而在正德官窯謎團漸漸撥雲見



圖二 明正德官窯 青花七孔球形器 大英博物館藏
Jessica Harrison-Hall, *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*



圖一 明正德 青花阿拉伯文七孔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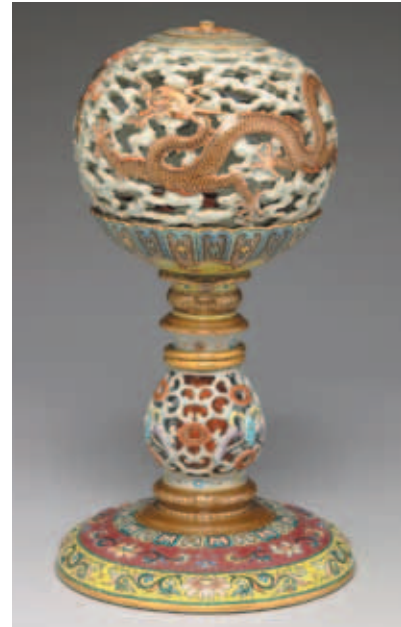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 約1686-1701 藍彩錫釉花鳥紋飾品 荷蘭德爾夫特製 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
引自呂章申，《瓷之韻：大英博物館、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瓷器精品》



圖十一 17世紀中葉 伊朗 青花瓶 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 余鳳瑾女士提供 2006年6月攝



圖九 清 鏤雕象牙球帽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八 清 乾隆 窯粉彩鏤空雲龍轉心冠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地區晚期窯業也製作球形器皿，例如伊朗的球形器（圖六），頂與器身各開一大一小圓孔，亦作水煙壺使用。而土耳其庫塔希亞（Kutahya）生產的〈懸掛裝飾器〉（圖七），通常器身上下各開一孔，以金屬鍊貫穿器身來作為懸掛吊飾。（註三）

然而，上述球形鑿孔器或改裝或製作，皆是為符合中東當地所需，況且僅有球形外表，實質結構與正德官窯七孔球形器不盡相同，對於清宮舊藏的這件作品恐怕無具體參考價值。回歸到中國當地的使用脈絡當中，這種球形、鏤孔又帶有器座的器皿，令人聯想到於本院屬清宮舊藏的冠架或帽架：這類作品除了以球狀做為置放冠帽的載體，其下往往連接一長柄的造型支撐物與器座，整體可逾四十公分高，材質多元，有以瓷器（圖八）、漆器、玉器、象牙（圖九）製成的。類似的設計概念，還可見於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所藏的德爾夫特飾品（圖十）（註四），以及同館藏伊朗製的中國風瓶（圖十一）。不過，即便這些作品可以做為帽架、冠架甚或假髮架使用，且部份或有鑿孔設計，但與正德青花球形器直接在頂上以七孔為飾截然不同。而假設正德官窯七孔球形器若是帽架，即便勉強可放置冠帽，但若想像實際使用後的狀況，這件低矮身形的七孔球形器表前後具有「賜福國土與子孫」之吉祥寓意的文字，將會被帽沿所蓋，因此筆者認為用途為「帽架」一說尚待商榷。



圖七 18世紀 懸掛裝飾器 土耳其庫塔希亞製 科威特國家博物館藏
引自Oliver Watson, *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*



圖五 1550-1600 珠寶鑲嵌白瓷薰香器 土耳其砲門宮藏
引自David J. Roxburgh, *Turks: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years, 600-1600*



圖六 17世紀 水煙壺 伊朗製 科威特國家博物館藏
引自Oliver Watson, *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*

測該器可能做為水煙壺使用。（註二）眾所周知，中東地區屢屢將收藏作品改裝加工，既可符合實用需求，又常以各色寶石金屬鑲嵌、順勢迎合伊斯蘭地區品味。這件球形器原製作年代在元代，相當於十四世紀，但是進奉於阿德比爾神廟時已是一六一一年。因此這種對作品用途皆是改裝後的推測，然而該器原先面貌如何不明，也難以推測最初製作的功能用途。

而與阿德比爾神廟並稱為中東兩大收藏的另一處：土耳其砲門宮，也藏有許多由中國瓷器改裝加工後的作品，其中〈珠寶鑲嵌白瓷薰香器〉（圖五），是將兩件對扣的明後期景德鎮白瓷碗，加上作為承盤的白瓷盤，再以華麗的紅、綠寶石及金屬絲與裝置等嵌合而成。從圖版上看來，該作品猶如一帶座的球形器，唯器身與器頂裝置有自由開闔的設計。綜上所述，許多球形器皿做為香爐或香薰使用，必定具備器可開闔或下有機關、承座的設計，這也與正德七孔球形器的結構大異其趣。



圖十五 北宋 青白瓷六管瓶 景德鎮出土湖田窯出土
引自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、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，《景德鎮出土五代至清初瓷展》



圖十六 宋 吉州窯青瓷花器 英國薩塞克斯大學藏
引自謝明良，《陶瓷手記》

比較，前述作品雖然頂部鑿有圓孔，但器身太短，而容器的空間大小卻是考慮器用功能的重要依據；又或者回到符合明武宗穆斯林身份的情境（註五），檢討於清真寺中實際使用的類似器皿，即便屬正德朝之後製作，也可能具有參考價值；今見北京牛街清真寺所藏清代〈雲頭紋香插〉一對（圖十四），作品頂端各有五個後鑿的小孔，其孔徑遠小於正德七孔球形器，這也符合立香插放所需；但孔徑也同樣是考慮用途的關鍵要素，大小一旦有異，所能置放之物也可能千差萬別。因此以上種種實例也無法用於推知正德七孔球形器的實際使用方式。

然而，與正德七孔球形器一樣頂

部鑲有七孔，且孔內空間有餘的作品，較早可見於景德鎮湖田窯出土的北宋〈青白瓷六管瓶〉（圖十五）；該器除了六管通器身，瓶口亦有鑲空七曜形孔之設計，從其製作構思推測亦屬花器，且可能是供養於佛前所謂「華瓶」一類的插花具。而為何要以七孔或多孔形制來做為花器？謝明良教授曾就《清異錄》中所謂的「占景盤」：「占景盤，銅為之，花唇平底，深四寸許，底上出細筒殆數十，每用時，滿添清水，擇繁花插筒中，可留十餘日不衰。」得出這類作品的面貌可能即是現藏於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的〈吉州窯青瓷花器〉（圖十六）與美國波士頓博物館的〈耀州窯青瓷花器〉（圖十七），這種

從正德官窯整體脈絡探討此器用途

前文把梳歷代許多球形或多孔器，僅供隔靴搔癢之比對，但也限於

多孔器與其用途
由上述可知，雖然現存作品中有數件球狀器皿的實例，但或器分為二，或器可開闔，或鑿孔位置不同，功能用途也差別甚大。況且正德官窯七孔球形器並無這些複雜結構，可見球形並非解決該器用途的最關鍵，或許應該從正德七孔器的「多孔」特徵著手。

若著眼於頂上開多處圓孔，且要為無拆卸功能的一整器，北宋景德鎮湖田窯製作的〈青白釉蓮蓬型薰爐〉（圖十二），器身模仿蓮蓬，頂蓋處也彷彿蓮蓬孔巧妙地開了七孔，且與正德七孔球形器同屬「七曜孔」形式，則恰恰符合了該條件。但從圖錄說明中可知其雖內部中空，但底部有一個



圖十三 明正德 二彩唐草紋鼓銅筆筒
法國吉美博物館藏
引自The World's Great Collections: Oriental Ceramics Vol. 7 Mus'ee Guimet, Paris



圖十二 北宋 青白釉蓮蓬型薰爐 1997
江西景德鎮湖田窯遺址出土
引自張柏主編，《中國出土瓷器全集·14·江西》



圖十四 清 雲頭紋香插一對 北京牛街禮拜寺藏
引自北京市宣武區伊斯蘭教協會，《清真古韻：北京牛街禮拜寺》



圖十七 宋 耀州窯青瓷花器 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藏
引自The World's Great Collections: Oriental ceramics, vol. 4. Iran Boston Museum, Teheran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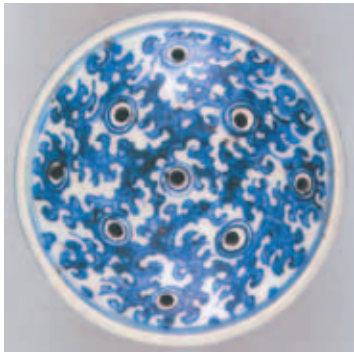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四 明正德官窯 青花阿拉伯文多孔瓶 香港私人收藏 引自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《機暇明道：懷海堂藏明代中晚期官窯瓷器》



圖二二 明正德官窯 青花波斯文瓶 英國艾爾莫林博物館藏 引自デイジー・リオン=ゴールドシュミット (Daisy Lion-Goldschmidt)，《明の陶磁》



圖二一 明正德官窯 青花開光阿拉伯紋異形花插 北京牛街禮拜寺藏 引自北京市宣武區伊斯蘭教協會編著，《清真古韻：北京牛街禮拜寺》



圖二五 明正德官窯 青花獅球紋九孔花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耿寶昌主編，《青花釉裏紅》（中）



圖二三 明正德官窯 青花波斯文瓶 大英博物館藏 引自Jessica Harrison-Hall, *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*

七孔球形器則器身較之略短；不過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亦有一件器身不高的《青花獅球紋九孔花插》（圖二五），雖然無款，耿寶昌先生根據紋飾風格定為正德年器（註九），也與正德七孔球形器同樣具有器頂帶圓孔且一體成型的特質。針對這種較為矮小而重心較低、形制安穩的作品，張謙德《瓶花譜》的〈品瓶〉篇即解釋了其插花妙處：「凡插花，先須擇瓶：口欲小而足欲厚，取其安穩而不泄氣也。大都瓶寧瘦毋過壯，寧小毋過大。極高者不可過一尺，得六七寸，四五吋瓶插貯，佳，若太小，則養花又不能太久。」若以正德官窯七孔球形器來插花，符合口小而不洩水氣，且器座厚重安穩的特質。況且若如文中所謂「四五吋瓶為佳」，則相當於正德七孔球形器的尺寸，可見這件作品在明人心中也是絕佳花器。

因此筆者推論，七孔球形器是正德官窯作為花器的新樣式。作品上的圓孔由於生在球形頂端，在花莖插入時能使花朵朝向不同面向角度，或含苞待放，或花枝招展，裝飾效果顯著。

所見工藝美術品並無相仿作品所致。不過，回到正德官窯整體的作品當中，雖然不見球形器，但是同形制的「中心大孔，旁等距六小孔」所謂七曜形器皿存世有例，如北京牛街禮拜寺所藏、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亦有類似作品



圖二十 清 乾隆 七孔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另外，藏於艾爾莫林博物館與克利夫蘭美術館的《青花波斯文瓶》（圖二二），其上波斯文字書寫潦草無法辨認，但是器頂飾有七孔，考慮此這兩件作品可以並列參考，也許用途也有關連。（註八）

以上三類正德官窯作品雖器頂鑿孔，但從身廣口窄的特色看來，可以推測用途即為花瓶無誤。而正德官窯

的《青花開光阿拉伯文多孔花插》（圖二一）。（註七）該作品器身各以圓形與複線菱形開光內書阿拉伯文，上部開光內為：阿拉伯文，「 أحمد الله 」，意為「阿拉將：裝飾、美化」；下部開光內單字為阿拉伯文：「 ملك 」，意為「國王、國家、政權」，這兩個開光內的文字可譯為：「阿拉會美化他的國土」，與正德七孔球形器意義相近。因此這兩件作品可以並列參考，也許用途也有關連。（註八）



圖十八 明 景泰款掐絲琺瑯鹿鶴長春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九 明 銅琺瑯七孔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第一屆新媒體創意競賽

時空之眼—Open乾隆皇帝的百寶箱

- 競賽項目：新媒體互動藝術、APP、動畫及微電影四類
- 開放乾隆皇帝 100 項精彩的器物、文獻及書畫素材供線上瀏覽及創作
- 得獎作品著作權由得獎者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共有
- 得獎作品將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年度大展同步展出
- 本競賽提供雲端創作服務

總獎金達 **178** 萬元

活動自即日起至7月29日止，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報名參賽
業學界團體15人以上者，執行單位可提供到場簡報說明服務

更多活動詳情請見 <http://www.creative.org.tw>



指導單位 行政院科技會談 主辦單位 國立故宮博物院

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MIC 創意產業中心

合作單位 中華電信 軟體合作單位 Microsoft CyberLink

結語

雖然正德官窯的主人—明武宗，留給後世的印象是花名不斷，但從史料看來，他其實頗有才情，並愛好語

言學習。（註十）而就正德官窯整體脈絡而言，此時也產出數量特別多的文房器具，例如筆山、筆盒、插屏等。我們可以想像，在風流天子明武宗的生

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

活中，佈置許多這類包含文房器具與花插的所謂「清供」用品，也為其書齋或周圍環境增添了不少文人雅趣。

註釋

1. 「帽架」之推測，請見Harry Garner, *Oriental Blue And White* (London: Faber and Faber, 1954), p. 28. 森達也，〈イランやきもの紀行〉，《陶說》第六五三期，二〇〇七年八月，頁七二。而「花插」之定名，則見：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輯，《故宮瓷器錄》第一輯·明乙·上編，臺中：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，一九六一，頁四四，與耿寶昌，〈明清瓷器鑑定〉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一九九三，頁一四，圖一〇九「正德器型示意圖（二）（球形花插）」，Jessica Harrison-hall女士推論若該器功能為帽架，則鑿穿七孔就無特別意義，傾向實際用途為「筆插」或「花插」，見於Jessica Harrison-hall, *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* (London: The British Museum, 2001), p. 197. 後透過佐藤サチ子女士轉知，Jessica Harrison-hall女士意見更正為「香爐」。
2. 此外，該器原被訂作十五世紀初期，相當於明代永宣青花瓷，李仲謀分別就該器物青花用料、畫法、紋飾佈局及使用題材等訂出該器應屬元青花，見李仲謀，〈關於伊朗阿德比爾陵寺青花球形器物的討論〉，《上海國際元青花研討會論文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博物館，二〇一，頁一八九。
3. 此段提到的兩件作品皆藏於科威特國立博物館，說明請見Oliver Watson, *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*, London: Thames & Hudson, 2004, p. 447, 474.

4. 過去這類作品被稱為「假髮架」，但因尺寸太小，近年又被更訂為陳設用途的「飾品」。詳見呂章申主編，〈瓷之韻：大英博物館、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瓷器精品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，圖八八，頁一五五。
5. 近年有許多研究指出明武宗可能信仰伊斯蘭教，並傾向「蘇非派」，並具有「蘇非教長」之身份，見駱愛麗，〈中亞穆斯林後裔在中國活動初探——以正德朝兩件鑲紅回文瓷器為基礎〉，《第六屆台灣與中亞論壇國際學術會議》，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會議論文，頁十。陳玉秀，〈以紋識意——從阿拉伯文紋飾談正德時期伊斯蘭教的意涵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一八四期，二〇〇六年十一月，頁七八—九一；卓鴻澤，〈正德的番、回傾向——大明皇帝對異族宗教的追求〉，收入林富士主編《中國史新論——宗教史分冊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二〇一，頁四三—四三八；拙著，〈真主的追隨者：明武宗及其官窯回文器皿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二十九卷第一期，二〇〇年冬，頁一四七—一二二。
6. 關於這類作品可能為花器的討論與解釋，請見謝明良，〈《清異錄》中的陶器史料〉，《陶瓷手記》，臺北：允晨出版社，二〇〇八，頁三三〇—三三一。
7. 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定名為〈花瓶〉的作品，器身安置在方型臺座上，雖然器頂已經損壞，但可與牛街禮拜寺所藏頂部完好，但器底

8. 殘缺的〈青花開光阿拉伯紋異形花插〉兩相對照，推測原器面貌為器頂有七孔且帶方形底座的作品。據聞於瑞典隆德市的文化博物館也有一件相同的作品，只是目前沒有刊載。見Jörg and van Campen, *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eum*, Amsterdam: Rijksmuseum, 1997, p. 36.
9. 金立言也曾提及這兩件作品意義相近，值得注意。見金立言，〈從流傳於東四清真寺的正德官窯青花清真言硯屏談起〉，《機暇明道：懷海堂藏明代中晚期官窯瓷器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二〇一，頁一八。
10. 耿寶昌主編，〈青花袖裏紅〉（中）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二〇〇，頁六三，圖五八。
11. 從種種史料文獻可以推測，明武宗於藏文與回文有一定之造詣，請見卓鴻澤，〈正德的番、回傾向——大明皇帝對異族宗教的追求〉，收入林富士主編，《中國史新論——宗教史分冊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二〇一，頁四一六，以及拙著，〈真主的追隨者：明武宗及其官窯回文器皿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二十九卷第一期，二〇〇年冬，頁一八〇—一八一。

參考資料

1. 明張謙德、明袁宏道著，張文浩、孫華娟編著，《瓶花譜瓶史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。
2. 陳肇光，〈故宮歷代香具圖錄〉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九四。